

## 甲午战后反割台运动及相关问题辨析

李细珠

**摘要：**甲午战败与乙未割台，是整个中华民族惨痛的历史悲剧。然而，“台独史观”论者却故意错解与歪曲历史，妄图为“台独”分裂活动张本。本文通过对乙未割台相关问题之学理辨析，认为乙未反割台运动是两岸官绅与军民合力的抗日保台运动；甲午战后唐景崧等清政府官员以台湾绅民名义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力阻日本割台的抗日保台团体，与“台独”毫无关联；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被迫“遗弃”台湾，致使台湾沦落为日本殖民地，甚至出现所谓“亚细亚孤儿”的心境，是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的恶果。从学理上廓清“台独史观”的谬误，有助于推进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甲午战争；乙未割台；反割台运动；“台湾民主国”；“亚细亚孤儿”

**作者简介：**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台海两岸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24VJXT02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265.9; 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5）05-0011-10

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 200 余年，这期间台海两岸逐渐完成一体化进程，成为大一统中国主权与领土不可分离的整体。令人痛心的是，甲午一战清朝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与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乙未割台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悲剧。学界关于乙未割台研究较多，基本史实是清楚的，<sup>[1]</sup>但长期以来由于“台独史观”的干扰，不少本来清楚的史实被故意错解和歪曲，各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在学界与社会上流行，并不时沉渣泛起，亟待从学理上予以辨正与澄清。本文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乙未反割台运动的重要史实、“台湾民主国”的性质以及所谓“亚细亚孤儿”迷思等问题进行学理上的辨正与反思，以期廓清“台独史观”的谬误，推进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

[1] 关于甲午战争、乙未割台及反割台抗日运动的重要研究成果有：梁华璜：《光绪乙未台湾的交割与保台》，高雄：庚子出版社，1974 年；施家顺：《“台湾民主国”的自主与溃散》，屏东：现代教育出版社，1984 年；黄秀政：《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年；黄昭堂：《“台湾民主国”之研究》，廖为智译，台北：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3 年；戚其章：《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刘雄：《乙未割台与台湾抗日反割台斗争新探》，北京：台海出版社，2005 年；吉辰：《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与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

## 一、乙未反割台运动史实辨正

甲午战争与乙未割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台湾历史的重大转折。日本武力侵略迫使清政府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割让台湾，使台湾沦为遭受日本奴役与掠夺的殖民地，是大陆学界的基本认识。但台湾岛内从李登辉时期开始日趋“独化”，“台独史观”通过政治化、学术化、社会化的途径，<sup>[1]</sup>不断影响着岛内民众对于甲午战争与乙未割台的客观认识。以下谨针对“台独史观”的荒谬论调，着重对涉及乙未反割台运动的性质与主体问题略作辨正。

乙未反割台运动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殖民侵略斗争的一部分，这是在中国史观指导下对这场运动性质的基本认识。<sup>[2]</sup>以往台湾学者也没有异议，如梁华璜认为：“乙未抗日是，在清廷无能、官绅逃亡之下，由刘永福融合内地兵勇与台湾的义民（军），共同抵御外族的反侵略战争。”<sup>[3]</sup>但是，近二十年来，“台独史观”在岛内甚嚣尘上，使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乙未反割台运动性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2015 年 9 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及数字文化中心共同举办所谓“翻转 1895——乙未之役 120 年档案特展”，公然宣称要“翻转”既有“‘民族抗日’的单一史观”，要“展现自牡丹社事件以来，台人或抗日、或合作、或投降的多元史料”。主办者强调：“从前国人对乙未之役的认知，多半只有民族抗日观点，但在求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岛民不是只有抵抗而已，仍有许多接受日本统治的商人。”甚至说：“过去只宣传一种历史，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中研院特设此展，企盼展示历史上的多元观点，跳脱以往‘抗日者才是英雄’的框架。”<sup>[4]</sup>显然，主办者所谓“翻转”就是用“多元”的障眼法，否定反侵略、反殖民的“抗日”，而认同接受日本统治的“合作”与“投降”。这样的“翻转”便自动落入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皇民”史观窠臼。2022 年 7 月，蔡英文出席乙未保台战役 127 周年纪念活动，特别强调“客家精神就是台湾精神”。她说：“当时的义勇军是历史上第一批保卫台湾的人，是我们永远缅怀的国殇，义勇军慷慨赴义、老少乡亲挑担奉饭，且不分族群只为守护家园，除象征客家人的硬颈精神，更提醒守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sup>[5]</sup>在这里，蔡英文不提“抗日”，只论“保台”，强调“台湾精神”，实际上是借所谓“乙未保台战役”这个历史符号，隐晦地宣扬其一贯主张的“抗中”、“反中”的“台独”精神。乙未反割台运动在台湾学界、政界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关于乙未反割台运动的历史认识，尚有两点值得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台湾人民应对乙未割台的主流是抗日，而绝非民进党当局所宣扬的“与日本人合作”。诚然，乙未割台之际确实有部分民族败类如辜显荣、李春生等主动与日本人合作，成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带路党”。更令人不齿的是，这些人后来还坦然接受日本殖民统治者授予的勋章，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但这只是反割台运动大潮流中的一小股逆流，不是主流。马关和议割台消息传到台湾，在籍工部主事、全台义勇统领丘逢甲以“全台绅民”名义上书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痛陈誓死抗日保台

[1] 李细珠：《“台独”史观平议》，《台湾历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朱时宇：《中华民族史观视域下的日据台湾史研究——驳“皇民”史观》，《台湾历史研究》2025 年第 1 期。

[2] 参见陈孔立：《关于台湾史学术体系的三点思考》，《台湾历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3] 梁华璜：《光绪乙未台湾的交割与保台》，高雄：庚子出版社，1974 年，第 102 页。

[4] “乙未割台特展‘中研院’开幕 台史所：将‘翻转单一抗日史观’”，<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688>。

[5]《悼念乙未战争英魂 蔡英文：“客家精神就是台湾精神”》，台湾《自由时报》2022 年 7 月 2 日。

的决心,有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sup>[1]</sup>丘逢甲在这里号召“全台绅民”誓死抵抗日军接收台湾,当然不包括辜显荣、李春生之流等少数败类,但这代表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共同心声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台民发布布告宣称:“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sup>[2]</sup>可见台湾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事实上,就在日军从基隆附近澳底登陆后,他们就发现了当地人并不心甘情愿与日军合作的实情。据日本人记载:“登陆点的当地人虽顺从,但自泄〔澳〕底至顶双溪,当地人却顽固不化。……有的居民家中还藏有武器弹药,因而不无危险。虽命令他们搬运物资,向他们征集物品,但他们倔强而不肯从命。以当地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多,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我军士兵监督,鞭打使役。总之,他们不惧我军,并有轻侮我军的迹象。”<sup>[3]</sup>台湾当地民众对日军入侵的抗拒心态显而易见。

另一方面,乙未反割台运动的主体不只是台湾人民,而是两岸官绅与军民的合力。为了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独史观”论者往往片面地看待历史,比如关于乙未反割台运动的论述,只讲在地台湾人抗战,而不及其他。吴密察认为:“乙未抗日保台战争的主力,可以说是台湾的当地居民;乙未抗日保台战争是一场地域乡民的保卫乡土的战争。”<sup>[4]</sup>黄富三写道:“1895年,清朝因甲午战争战败,据马关条约,台湾无需条件移交日本,台人孤立无援,对林家无异晴天霹雳。台湾绅民仍不死心,于5月26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拥护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以抗日保乡,林献堂之父林文钦亦募义勇响应。但以唐景崧为首的清朝官员无心抗日,纷纷内渡,以致群龙无首,军心涣散。5月29日,日军登陆盐寮,6月7日占领台北,并拥军南下。台人虽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终因仓促成军,缺乏训练、装备、粮饷,难以抵挡近代化军队而溃败。”<sup>[5]</sup>从这些论述来看,好像乙未反割台运动只是台湾当地居民自卫乡土的事,以唐景崧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不过是逃兵,而清朝在台各路驻军更像是不存在似的被完全忽视了。

事实上,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朝调动了湘、淮、闽、粤各省军队赴台守御。据思痛子《台海思恸录》记载,其时台湾巡抚邵友濂奉诏督办全台军务,奏调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率所部淮勇2000余人分驻基隆、沪尾海口,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所部粤勇3000余人驻台南、恒春、凤山一带,台湾总兵万国本部兵守御安平、旗后各口。邵友濂还咨请闽浙总督谭钟麟檄调候补总兵廖得胜、海坛协副将余致廷各率湘勇数百人来台分驻沪尾、观音山等处,又命前湖北鄖阳镇总兵綦高会赴江南新募湘勇1500人驻官渡口,命记名提督张兆连统4营守基隆口,命候选道林朝栋统土勇1500人驻狮球岭以守基隆后路。随后,邵友濂以兵事非其所长,求去位,清

[1]《收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全台绅民誓死守御》(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7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88-289页。

[2]蔡尔康等编:《中东战纪本末》,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203页。

[3]《日清战争实记选译》,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88页。

[4]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历史学系编印:《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第549页。

[5]黄富三:《林献堂与三次战争的冲击: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战争》,台湾《台湾文献》57卷1期,2006年3月。



廷以藩司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咨请闽浙总督檄调福建候补道杨汝翼募湘勇 1500 人赴台驻中路，命候补知府朱上泮募湘勇 2000 人驻守澎湖，为澎湖镇总兵周振邦增兵 2000 人，又命守备胡某领粤勇 1000 人在基隆、沪尾一带遍开地营，并征前澎湖总兵吴光亮率所部 2000 人为粤军统领，名其军曰“飞虎”。唐景崧还暗中招致“能于水底用兵”的“奇能侠士”吴国华、胡友胜、庞某来台投效，又命粤人杨永年赴粤募“海盗亡命”1000 人，檄副将黄翼得募粤勇 3000 人，并募东莞县人精于线枪者 1000 余人，分驻基隆、沪尾、新竹各口。唐景崧又奏派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广募民兵为义勇，以辅官兵不逮，编入伍者号 140 营之多。“一时湘、淮、闽、粤、土、客诸军，风聚云屯，号三百数十营，兵力不可谓不厚矣。”<sup>[1]</sup>

在乙未反割台运动中，正是在清朝官员的组织与领导下，清朝驻台军队、台湾义勇和民众并肩战斗，顽强抗击入侵的日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史篇。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各方势力促成下组建“台湾民主国”，树起了抗日保台的大旗。其他清朝官员如俞明震、陈季同以及台湾知府黎景嵩，黑旗军将领刘永福、杨泗洪、吴彭年，新楚军将领杨载云、李维义，台湾士绅丘逢甲、林朝栋、许南英，义军首领吴汤兴、徐骧、姜绍祖、林昆冈，等等，均不同程度地加入这场抗日保台运动之中，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这个时期的武装抗日力量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台湾本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留在台湾的原来的驻军（主要是刘永福所部军人）。”<sup>[2]</sup>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 二、“台湾民主国”的性质问题

为了抵抗日本侵占台湾，在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台湾官绅就地成立“台湾民主国”，动员台湾各地民众，与侵台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这个“台湾民主国”可谓台湾官、绅、民联合反割台运动的产物，其性质非常明晰，但是由于“台独史观”的污名化，却莫名其妙地显得扑朔迷离。

关于“台湾民主国”的性质问题，最关键的分歧点就在于其是抗日团体还是“台独”团体。有鉴于政治形势与时代背景，“台独史观”论者对“台湾民主国”性质的评价有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台独”大佬史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日本用日文撰写、20 世纪 80 年代初秘密出版中文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仅隐晦地指明“台湾民主国”强化了“台湾人的意识”。他说：“‘台湾民主国’虽说是以独立自主为宗旨，但是，其所代表的思想意识，并不一定和台湾本地人大众相吻合，而且其中心人物不外乎仍是前清文武官员及其附庸的台湾士绅，所指向的政治目标也脱离不了老一套的满清统治下封建中国之圈内。就是说，民主国未有完全建立在台湾开拓者子孙即台湾本地人大众的基础之上，所以昙花一现，诞生不久即告夭折，只在台湾社会发展史上留给后代的知识分子在强化其台湾人的意识上加添若干影响。”<sup>[3]</sup>“台独”学者黄昭堂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日本撰写、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岛内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民主国”之

[1] 思痛子：《台海思恸录》，《台湾文献丛刊》第 40 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年，第 2-4 页。

[2] 张海鹏：《研究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五点认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导言》，《台湾历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

[3]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蓬岛文化公司，1980 年，第 254 页。

研究》，一方面肯定“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性质，认为“台湾民主国建国之目的乃在于阻止日本占有台湾，而建国为抗日手段而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强调“台湾民主国”的“独立国家”性质，认为其是“统制力薄弱之事实上的国家”。<sup>[1]</sup>21世纪初，陈佳宏研究“台独”运动史就毫无顾忌了，直接让“台湾民主国”在其所谓的“台独”运动序列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说：“台湾民主国”是“台湾史上第三次‘客观的台独’”。同时他又指出：“台湾民主国虽然一度具有‘客观的台独’，但几无‘实质的台独’及‘主观的台独’可言；一方面想追求‘法理的台独’，但在‘建制的台独’上又自甘沦为清帝国的从属。”<sup>[2]</sup>尽管他在文字上绕来绕去，但他心目中的“台湾民主国”总绕不出“台独”的范畴。

历史上的“台湾民主国”究竟是“台独”团体还是抗日团体，回到历史现场便会一目了然。“台湾民主国”自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在台北成立，到同年九月初四日（1895年10月21日）台南府城陷落而灭亡，总计存在150天。这期间，可以五月十四日（6月6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离台内渡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唐景崧为“总统”，后期以南澳总兵帮办台湾防务刘永福为首领，正是唐景崧与刘永福相继领导了清朝在台驻军与台湾人民的抗日保台运动。

在前期，尽管时间不长，但唐景崧并没有屈服。本来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唐景崧已奉旨“开缺来京陛见”，<sup>[3]</sup>是可以内渡而不顾，他却接受了在台官绅谋求自立保台的“台湾民主国”之“总统”职位。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他毕竟暂时留下来了，这无疑有助于鼓舞在台军民抗日保台的斗志。唐景崧上奏清廷诉说其个中委屈为难之处，有谓：“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台民闻割台，复望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于五月初二日齐集衙署，捧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旗，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允暂视事，将旗发给各炮台暂换，印暂收存，专为交涉各国之用。一俟布告各国，并商结外援，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sup>[4]</sup>这里所谓“遵奉正朔，遥作屏藩”，是对“台湾民主国”尊崇清朝的确切定位。“台湾民主国”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改年号为“永清”，有永隶清朝之意。唐景崧还清楚地说明了“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就是“拒倭”即抗日的权宜之计，只要将来有机会，当“仍归中国”，而他自己则虽然暂膺“台湾民主国”之“总统”，但却永远是清朝的臣子。他说：“全台不服倭，因愿为圣朝之民。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机，自仍归中国。臣为民劫留，暂缓赴京陛见，连日以来，悚惶万状。惟此后不无奏咨之件及与各省文件公牍，拟用臣开缺本衔及台湾巡抚关防，一息尚

[1] 黄昭堂：《“台湾民主国”之研究》，廖为智译，台北：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3年，第218、221页。

[2] 陈佳宏：《“台湾独立”运动史》，台北：玉山社，2006年，第47、48页。

[3] 《电旨·奉旨唐景崧即开缺来京并台省大小官员陆续内渡》（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8册，第241页。

[4] 《收前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处理台民自立民主一事并起程赴京》（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8册，第338-339页。

存,未敢稍逾臣节。”<sup>[1]</sup>在此,唐景崧不但解释了“台湾民主国”的旨意,而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自日军澳底登陆后,唐景崧一直在台北省城指挥各路驻军抵抗日军进攻,直到日军兵临台北城下,方才撤离内渡。俞明震《台湾八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唐景崧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至十二日(1895年5月28日至6月4日)镇守台北的若干侧影,其中说到他在调兵遣将苦撑危局中“五天不睡”。<sup>[2]</sup>可以说,作为清朝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大员并暂膺“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唐景崧,在乙未割台之后为抗日保台尽了最后一份心力。

在后期,虽然刘永福不愿意接任“台湾民主国总统”职务,但他坚定地组织了台南保卫战。唐景崧内渡后,台南各界数千人集会,公推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并铸“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银印一颗,曾派代表三次给刘送印,均遭刘坚拒。他说:“尔等众百姓公举我做总统,送印而来,可以不必多此一举!……今日之事,军事也,土地之存亡,人民之关系,千钧一发,甚宜注意。其实事在将兵互相得力,咸皆用命,或者易亡而存、转危为安,从此上国衣冠不沦夷狄耳。区区此印,无能为力。盖有在此不在彼之故,诸君以为然否?请将印带回销之可也。”<sup>[3]</sup>刘永福不慕虚名,只是实心办实事,心心念念的是筹集军饷,齐心协力抗日保台。有感于台南绅民的忠义,刘永福与他们立下“盟约”,宣称:“永福承天子命,帮办台防,闻和议已成,遂终朝陨泣。在皇上苦衷,良非不得已;而臣子效力,正在此时。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呼吁与台南绅民“众人一心,兵民一气,不计生死,共御倭夷”。<sup>[4]</sup>刘永福抗日保台的决心无比坚定。

当日军从台北南下进攻,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义、凤山相继失守,形势危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1895年10月19日),日军大举进攻台南府城。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黑旗军刘德标的七星队等清军,以及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在台南府城北面曾文溪构筑最后一道防线。据日方记载:“曾文溪左岸较高,自成高三、四米之堤岸。右岸是我军的进军道路,是广阔的平原。沿岸是沙地,不便步行,因此士兵运动十分迟缓。刘永福利用这种地形,以此作为台南以北之要地,企图以此阻止我军前进。四千余名黑旗军在左岸高地筑有防御工事,在曾文溪右岸埋有三十九个地雷,并于各处设下陷阱,涉渡点水下还敷设水雷,可谓敌军的精兵全集中在这里了。……敌军始知我军已经逼近右翼,于是以猛烈射击应战。我军并不与敌军交火,继续前进,进一步靠近敌人,开始射击,进而白刃相接,击退了敌军,占领了曾文溪。”<sup>[5]</sup>曾文溪失守,台南没有屏障。刘永福在绝望中决定内渡,“粮饷已罄,人心已变,将有哗溃之虞,即自己近身之人,其举动亦多有不同。公睹此情形,无论如何,拼死亦要内渡回也。”<sup>[6]</sup>刘永福无奈内渡之后两天,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日军进占台南府城。至此,“台湾民主国”反割台运动以失败告终。

[1]《收前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台民强留暂缓赴京》(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8册,第368页。

[2]俞明震:《台湾八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373-378页。

[3]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408-409页。

[4]《刘永福等盟约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451、454页。

[5]《日清战争实记选译》,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第641页。

[6]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第413页。



甲午战后唐景崧等清政府官员以台湾绅民的名义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两岸官、绅、民联合反割台运动的产物。这是一种力阻日本割台的权宜性策略，并不是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独史观”论者以“台湾民主国”为“台独”的源头，纯属篡改历史的无稽之谈。

### 三、所谓“亚细亚孤儿”迷思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台湾人民的苦难史，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历史是残酷无情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在台湾，有些人由于这段历史而对大陆抱有怨恨情绪，也有人利用这段历史煽动和制造民族分裂，为“台独”或“独台”寻找历史根据，其实都是对历史的漠视或歪曲。

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孤儿意识”。所谓“亚细亚孤儿”情结，却经常被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用来作为“台独”的一种依据。“台独史观”论者则把乙未割台看作台湾“被遗弃的历史”，就是认为台湾被清政府遗弃了。吴密察说：“台湾在马关条约中被清朝当成‘代罪羔羊’割让给日本，使台湾读书人、士绅有被遗弃的感觉，台湾是‘弃地’，台湾人是‘弃民’。但是更广泛的普通台湾人，则被卷入一场台湾史上空前的最大战争中，这场战争始于被清朝官员、台湾上层士绅（如丘逢甲者流）号召出来抗战。但是当事不可为时，这些清朝官员、台湾士绅却率先遁逃，留下不能走避的平常百姓奋战保卫家乡，多数人死于战斗，甚至死于屠杀，多数家屋毁于天外而来的战火，他们被遗弃、被出卖，家毁人亡，却无名无姓。”<sup>[1]</sup>所谓“亚细亚孤儿”迷思，便与这种“被遗弃的历史”论调一脉相承。

马关议和与乙未割台是清政府甲午战败的痛点。对此，论者一般都能同情地理解清政府保台的努力与割台的苦衷，但“台独史观”学者却对清政府的应对提出批评，认为“满清政府希望早日议和，并早日议毕签约，是决策上的不智”，甚至说“中国配合日本要求，迅速议结和约，致使台湾割让尘埃落定”。这些荒谬论调立论的基点是所谓“中国的当权者为了自己的或中国的利益，无暇计及台湾人民的愿望与感受”。<sup>[2]</sup>这里把“中国”与“台湾”对立起来，充分暴露其“台独史观”的本质。

要破解所谓“亚细亚孤儿”迷思，就必须回到历史现场，方能看清历史真相。就中日交战双方而言，若说谁最想尽快结束议和，则是日本而非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发达以后便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但毕竟其国力不甚强大，可以说是用国运相赌以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随着战线拉开日本国力难支，渐显强弩之末态势，所以日方有非常明显的见好即收的意图。马关议和时，伊藤博文即明确表示：“和款一事，两国人民盼望甚殷，愈速愈妙，万不能如平时议事延宕。且两军对垒，多一日则多伤生命矣。”在谈判过程中，伊藤不时催促李鸿章尽快达成和议，但李鸿章并不着急，一再拖延时日。<sup>[3]</sup>从整个谈判过程来看，李鸿章苦苦相争、

[1] 吴密察：《“历史”的出现》，黄富三、古伟瀛、蔡采秀主编：《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筹备处，1997年，第18页。

[2] 叶振辉：《台湾割让前的英援法援交涉》，《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94、496、497页。

[3]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台湾文献丛刊》第4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18-21、47-54页。

几近哀求的是能否尽可能少点割地、赔款,而伊藤博文则斤斤计较、寸步不让地算计着签约与换约的时间,究竟是谁想方设法尽快结束议和不言自明。

至于说“中国配合日本要求”迅速签约割台更是无稽之谈。在马关议和过程中,尽管伊藤博文交给李鸿章议和“节略”时蛮横地宣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李鸿章还是提出“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的质疑,并表示:“台湾不能相让!”伊藤直接威胁:“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sup>[1]</sup>显然,李鸿章并不想“配合”伊藤博文,毋宁说是伊藤挟战胜淫威强取豪夺。不但亲历议和的李鸿章不愿意割台,其时现管官员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也不愿意割台。唐景崧风闻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甚至主张不惜再战。有谓:“赔兵费、通商则可,与土地则不可。……北辽南台,二者失一,我将无以立国,外洋谁不生心,宇内亦必解体。战而失地,犹可恢复;和而失地,长此沦陷。委香港与英,乃小岛耳,贻害已甚,况咽喉肩背之地耶!必不得已,惟仍出于战,以偿彼之费为用兵之费,倭力有限,再与坚持,或易就范。”<sup>[2]</sup>其他如钦差大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与闽浙总督边宝泉等督抚大臣,均对马关和议割台等条款提出反对意见。刘坤一对于割让“完富未扰之地”台湾颇不以为然,认为:“辽、台并失,南北俱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sup>[3]</sup>张之洞从盛宣怀处得知割让辽东与台湾全岛,对于大局败坏,深感痛心,有谓:“北无旅顺,南无台湾,中华海面全为所扼,此后虽有水师,何从施展。梗辽、沈之路,扼津、登之喉,卧榻养寇,京师岂能安枕。北洋三省,沿海水陆,永远不能撤防,国用如何能支。畏倭如此,各大国必然肆意要挟,如何能拒。”<sup>[4]</sup>庆裕、边宝泉与唐景崧又以台湾民众不服,电奏清廷认为:“按公法有‘均势’一条,又‘众民不服者其约可废’,此事赔款则可,割台则断不可。”他们恳请总理衙门“会集驻京各国公使,从公剖断,速罢前议、救斯民”。<sup>[5]</sup>这些督抚大臣均坚决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即使在《马关条约》签订而割台已是既成事实之后,他们都甚至主张不惜毁约与日本再战,怎么能说“中国配合日本要求”迅速签约割台呢?

事实上,清政府也没有轻易放弃台湾,就在割台已成定局而唐景崧请求清廷拨款救援时,清廷仍在想方设法施以援手。唐景崧请求清廷拨款200万两救急,清廷电谕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先筹款50万两解往备用。<sup>[6]</sup>张之洞即刻命上海道先将所借洋款内提30万两设法稳妥

[1]《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台湾文献丛刊》第43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第21、27、30页。

[2]《收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议和断不可割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7册,第236-237页。

[3]《钦差大臣刘坤一奏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95年4月16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63页。

[4]《致台北唐抚台云和议已画押实要挟太过等事》(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发文),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5辑第104册,台湾历史博物馆、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台湾大学图书馆,2009年,第497-498页。

[5]《收福州将军庆裕等电·台民不服请总署罢割台之议》(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7册,第314页。

[6]《为电致军务处请拨饷二百万两济台事》(署理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其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5辑第106册,第359页。



解往台湾。<sup>[1]</sup> 清廷还电谕张之洞设法给台湾解往洋枪一万枝。<sup>[2]</sup> 直到“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后,清政府再也不便向台湾运送饷械了。张之洞电奏:“前奉旨接济台饷五十万及军火各节,已拨三十万;现既自为民主之国,以后饷械等项,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奉旨:“电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所有饷械自不宜再解,致生枝节。”<sup>[3]</sup> 清廷也是在无可奈何地吞下割台的苦果。

清政府被迫割台的无奈,确有难言的苦衷。李鸿章签约之后电奏清廷解释割台缘由与苦衷,有谓:“唐署抚各电自是正论。惟倭志实欲添兵北犯京都,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之理揆之,设令闯入京畿,届时何求不得,岂独台湾?今既遵旨定约,似难反悔,再召大乱。”<sup>[4]</sup> 清廷也曾电谕署台湾巡抚唐景崧说明不得已割台的苦衷,认为:“台湾久隶版图,感戴朝廷恩泽,一闻他属,忠愤勃发,自在意中。但时势所迫,勉从其议者,大要约有两端:一则战不可恃,虑其进逼京师,利害所关,视台尤重;一则台无接济,一拂其请,彼必全力并攻,徒损生灵,终归沦陷。”不但如李鸿章一样强调京师重于台湾,而且进一步说明台湾难守的困境,并以唐景崧此前屡次电奏台湾防守困难的种种说词为证,有谓:“查自三月屡次来电有云:‘我无兵轮,绝地坐困,其危可知。’有云:‘台营分布则少,防不胜防。’有云:‘枪患不足,勇难即到。’有云:‘一二仗后无营替换,久支强寇,实无胜算。’各等语。此皆贵署抚体察实在情形,不可因一时义激遂置前电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sup>[5]</sup>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实有难言之隐,怎么能说是清政府主动“遗弃”台湾呢?

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被迫割让台湾,致使台湾沦落为所谓“亚细亚孤儿”的悲惨境地,是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的恶果。甲午战争时代整个中国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割台不只是台湾同胞的悲哀,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伤痛。“台独史观”论者没有“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概念,因而无法理解被迫割让台湾正是损坏中国自己的利益,以至于得出所谓“中国的当权者为了自己的或中国的利益,无暇计及台湾人民的愿望与感受”的荒谬论调。

## 结 语

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苦难历史。然而,“台独史观”论者却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抹黑与歪曲历史,就乙未割台相关问题搬弄是非,妄图为“台

[1]《致上海道刘道台》(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发文),《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5辑第106册,第503-504页。

[2]《电旨·奉旨台湾需用洋枪张之洞再拨粤省枪只解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8册,第138页。按:正文里面是“张之洞再拨奥枪一万枝”,此“奥枪”似为洋枪之一种,而不是“粤枪”,故标题“张之洞再拨粤省枪只”有误,且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似亦无权调拨“粤省枪枝”。

[3]《电致总署台已自主未便接济饷械事》(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日,其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第5辑第107册,第70页。

[4]《收大学士李鸿章电·台民不服》(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7册,第311-312页。

[5]《发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和议已定应妥为抚循开导台民免滋事端》(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第227册,第278-279页。

独”分裂活动张本。本文通过对有关乙未割台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学理辨析,得出如下三点结论:其一,在乙未反割台运动中,台湾人民应对乙未割台的主流是抗日,不是与日本人合作;乙未反割台运动的主体不只是台湾人民,而是两岸官绅与军民合力的反日运动。其二,甲午战后唐景崧等清政府官员以台湾绅民的名义成立的“台湾民主国”,是力阻日本割台的抗日保台团体,并不是要分裂台湾,与“台独”毫无关联。其三,所谓“亚细亚孤儿”迷思,与“台独史观”论者所谓“被遗弃的历史”论调沆瀣一气。事实上,清政府在甲午战败之后被迫割让台湾,致使台湾沦落日本殖民地,部分台湾民众更因此而产生所谓“亚细亚孤儿”的心境,均是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的恶果。回到历史现场,甲午战败与乙未割台,都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悲剧。

(责任编辑 张 华)

## **An Analysis of the Anti-Cession Movement after the China-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nd Related Issues**

**Li Xizhu**

**Abstract:** The defeat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and the cession of Taiwan in 1895 were a profound national traged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However, advocates of the so-called “Taiwan independence historiography” have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ed and distorted history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separatist activities. Through a scholarly analysis of 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 cession of Taiwan in 1895,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nti-cession movement was a collective effort of officials, gentry, and the peopl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efend Taiwan. The so-called “Republic of Formosa,” established by Tang Jingsong and other Qing officials in the name of Taiwan’s gentry and commoners after the war, was essentially an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to prevent the cession and defend Taiwan, and bore no connection whatsoever with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Qing government, following its defeat in the war, was forced to “abandon” Taiwan, leading to the island’s tragic story as an “Orphan of Asia,”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t aggression. By clarifying the fallacie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historiography,” this article advances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 China-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Cession of Taiwan in 1895; Anti-Cession Movement; “Republic of Formosa”; “Orphan of Asia”